

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中的理论建树

范湘涛 范贤超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2;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中苏论战关涉世界的矛盾、战争与和平、国家与革命、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纲领和内部团结等诸多问题。在这场论战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的反复较量中,是有诸多理论贡献的。

〔关键词〕 毛泽东; 中苏论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理论建树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4)01-0007-05

20世纪中叶,中苏两国两党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特别是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毛泽东组织领导,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的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文章(通称为“九评”)把这场论战推向了高潮。中苏论战,作为两国两党的一场原则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认为,在这场论战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彻底破产。学界基于这场论战中的特定语境,某些观点的历史局限性,常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很少去挖掘它的当代意义。实际上,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当我们再次审视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罕见的由两国两党主导的大论战,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洞察力,穿越历史的迷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诸多科学预见,而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行的反复较量中,是有诸多理论贡献的。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基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发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团结、斗争,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一分为二的。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团结。

无数事实说明,赫鲁晓夫反对和背弃马克思主义,从苏共二十大以来,形成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收稿日期〕 2013-10-20

〔作者简介〕 范湘涛(1971-),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部讲师;范贤超(1941-),男,湖南隆回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九评”的第七篇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对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着重予以了揭露。文章系统地批驳了所谓“反苏”、所谓“争夺领导权”等谬论，文章强调指出，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疯狂扩军备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迫切地需要团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遵守“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这是维护和加强团结的唯一道路。同时指出苏共领导演变成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的产物。毛泽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主张必须实现党际平等，强烈反对搞“老子党”、“儿子党”。

诚然，毛泽东提出过“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路线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但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有个统一的阵营，阵营要有一个领导中心，领导中心要有一个正确的纲领路线，来协调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行动。

毛泽东的这个观念，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他说“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一个为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相互调节，相互合作，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出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国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谁来为首呢？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首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公开的场合，仍然强调友好合作，同志式的团结，并支持帮助苏联处理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大会，共有5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兄弟党加强团结的辩证法。因此，苏联方面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

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公开检讨了苏共过去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中苏关系有所好转。但从苏联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开始，到1958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苏关系走向决裂。只是中国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并没有把矛盾暴露在世界面前，直到1960年6月以后，中苏论战才走向公开化。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大会，经商定，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利用这个机会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6月23日下午，苏联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译文本长达84页。《通知书》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在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24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苏联方面发动了有准备、预先策划好的大多数政党向中国共产党围攻的事件。中共代表团根据“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方针，发表了声明，对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有原则的斗争。

综观中苏关于党际关系的纷争，毛泽东认为，之所以提以苏联为首，并不是要实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更不是搞“父儿党”，而是必须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记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由、一律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兄弟党之间，没有太上皇，他们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同时又是相互联合的，对有关的共同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的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斗争中的共同行动。他承认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但是这种前列地位，并不是长期的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

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的党犯了错误，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因此，现在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如果任意地听从他的摆布，就必定给苏联的无产阶级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必须揭露、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表明，毛泽东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党际之间的关系，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线和策略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策略上，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表现在国内问题上，“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则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在“九评”的第六篇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中，对于“和平共处”，无论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认为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一项政策，但这种“和平共处”必须是靠斗争得来的，不能取消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平共处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但是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看成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于一切的最高原则，是现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而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引申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进而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实质就是苏美联合主宰世界。

而“九评”的第八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着重批驳了“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等谬论。文章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理论，只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白劳德的一路货色，但是，在当时，他们只是局部问题，赫鲁晓夫凭借苏联的威望，却成了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全面性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这个普遍规律，承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暴力

革命是社会主义诞生的助产婆，历史表明，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经验证明，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和平过渡”的设想是错误的，“有可能通过改革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的翻版。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样，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指出，除了用和平演变等手段改变他们的策略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共处。他们要发动战争，还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怕，不能解决问题。他摔，我们也摔，打得一塌糊涂，打了之后，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我们再在废墟上建设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为此，他在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时指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者，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条总路线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区别在于用人民的革命斗争，争取和平，而赫鲁晓夫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这种乞求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而在国内问题上，赫鲁晓夫认为，由于苏联国内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级与现在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与此相联系，还宣布可以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

段中，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穿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用苏联报纸的资料论证了像苏联这样搞了4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后来，毛泽东作了一首打油诗：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万民共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三、过渡时期的新理论

在中苏论战中，为了批驳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于1962年9月29日，以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我们把它称为过渡时期新理论，就在于这里把过渡时期延伸到了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这无疑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展。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53年，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国将在10到15年的时间里，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但由社会主义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由于时代条件的原因，当时还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只是设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成之日，就是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之时，是中国没有停顿的不断革命。

正是出于这个思路，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于书中所写的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的第一段，他提问说，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他作出回答，肯定是后者，现在有些同志

把两个过渡理论看成相互对立，互不相对关系，从而肯定小过渡的正确性，批判大过渡的错误性，这是一种误读。其实，两者是一个包容关系，小过渡含在大过渡之中。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经过若干历史阶段，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过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也有发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因此，毛泽东把过渡时期肯定为由资本主义直接到共产主义来到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无疑在理论上都是有益的思考，并不能说有什么错，是符合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的。之后邓小平又设定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符合中国特定国情的，是对毛泽东过渡理论的发展。

大过渡理论除了包含的时间长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更本质的内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斗争。因此，这个过渡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了复辟与反复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矛盾和斗争，存在复辟与颠覆的危险性，必须坚持、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点，较之小过渡理论，要清晰、鲜明得多。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也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主张在继续完成政治路线上、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在这里，政治路线上、思想战线上革命的性质以及采取何种形式，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帝国主义颠覆的危险性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变质的严重性，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性。

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不是他个人兴之所至而提出来的，而是他对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的理性思考。

第一，1962年由于美国的侵略政策，造成了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周边环境很不安宁，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转向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同时，蒋介石又在叫嚣反攻大陆，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中，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极力推行“三和”、“两全”政策，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这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理

性思考中占了重要位置。

第三，经济困难时期开始以来，国内、党内出现了对困难的看法和解决困难方式方法的不同声音和矛盾。使他联想到南斯拉夫、苏联经济建设的情况，感到中国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

第四，是对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理解。就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当刘少奇讲到斯大林说谁胜谁负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时，毛泽东插话说：我是根据列宁的说法，列宁有预见，他是在1924年死的，革命胜利后有7年的实际经验。的确，马克思曾经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也曾指出：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在这里，马克思、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行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大过渡理论的问题，不在于毛泽东看到了这种阶级斗争，而在于他看重了这种阶级斗争，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事实是，经

过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但在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还可能激化。只是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而是以残余形态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却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它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最后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属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范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了正确评价，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四、结语

我们认为，这场论战，较之马克思反对巴枯宁、列宁反对伯恩斯坦、考茨基的斗争意义更加重大。因为那些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局部问题，这次却是关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全局性问题。这场斗争虽然未能挽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局面，但这场论战对于今天在实践中保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能经受敌对势力西化的考验，乃至经得起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环境的考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毛泽东在这场论战中的理论建树对于陷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更是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裴亮亮)